

小城故事

# 绥棱有个天放村 (二)

孙秀

(接上期)上期讲到,于天放将军由于汉奸告密被捕的过程。那么在狱中,他受到了怎样的酷刑?

1951年11月,东北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牢门脱险记》,真实地记录了面对敌人打手板、鞭背、灌凉水、吃红枣、电刑等酷刑,于天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。对此,当时抓捕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枝,1956年被公安部审讯时,他在供词中说:“我尊敬为正义而舍身的于天放将军。”

于天放的经历,可以说是东北抗联在东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最有力的证明,更是东北抗联精神具体体现。

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于天放在监狱是怎样同敌人进行斗争的。

被捕的当天晚上,于天放被押在庆安县监狱的留置场(也就是拘留所)。这次被捕,是庆安县伪警务科长、汉奸田自伦带队执行的。于天放在庆安被关押20多天。他所呆的地方环境很差,每天两顿饭,每顿就一碗掺一半糠的苞米稀粥,没有咸菜。整个监狱30多人,个个饿得面黄肌瘦。

对敌人来说,于天放是“特别犯人”,所以监房只有他一人进来后可以吃好的,于天放把敌人送来的白面饼分给大家吃。而且自己绝食斗争好几天,要求监狱给大家改善伙食,增加粮食,斗争结果得到初步胜利。在这里关押的人员每顿饭增加到两碗用好米做的粥,并给盐豆子或咸菜吃了。

1945年1月上旬,敌人把于天放解送到北安(那时北安是伪北安省的省城)。大概在八九点钟,由庆安上了火车,11点左右到达北安,把他关在了伪警察厅特务分室(当时也叫政治犯监狱)。

下火车时,把他的眼睛用布紧紧蒙上,拉上了汽车。车站离监狱只有一里半的路程,为了便于于天放摸不清方向,汽车故意左拐右拐走了10多分钟,好像道儿很远。到监狱后,又顺着走廊绕了好几圈,让他感觉到监狱很大,跑不出去。到了监房,才把蒙眼的黑布打开。沉重的脚镣子、越动越紧的手铐子,勒着脖子绑着两只胳膊的捕绳,在监房里都解了下来。

于天放被押在第二号监房,二号监房是他受折磨的地方、也是他斗争的地方,更是他最后胜利的地方。日本战败投降以后,他去监狱看过两次,每次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,同时也感到无限的兴奋。

特务分室是英文字母U字形的建筑,从外表一看就是个宿舍的样子,一般人不会注意。于天放住的监房是东厢房,面向西。监狱内从南往北排列6个监室,第一号监室是仓库,其他5个监室是住人的。室内一面是铁窗,一面是四寸见方的木栏,木栏之间的空隙只有拳头宽窄。整个监房还有3层铁门。看守全部是日本人,敌人在5个监房外和铁门里,看着所谓的“犯人”,并在这里睡觉。敌人进出后,都立刻把门锁上,关押在这里的人受刑法折磨那是常事儿。

北安街的人们,都管特务分室叫“阎王殿”。特务分室里上到“事务官”(也就是主审官)下到伙夫、杂役,清一色都是日本人。抓人、放人,审讯、拷打,都在夜间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特务分室反倒人声嘈杂起来,声音凄惨,那是中

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这里受刑、受罪呢。

于天放入狱头一个时期,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日本鬼子想收买他,各方面的高级官员,假装殷勤到监狱来“慰问”,问他“冷不冷?”“生活得好不好?”有时候还假模假样故意的把看守“训”一顿。饮食更比别人特殊,完全给肉、给面吃。此时,于天放心想:该吃吃、该喝喝,抗战时期营养太少了,吃了这些,身体健康了,就能更好地与敌人做斗争。

敌人用这种无耻的手段,满以为可以使一个共产党人忘本变节。但他们想错了,共产党员是坚贞不屈的。

当于天放对党组织、对抗联军队、对地方救国会组织一字不提,或故意胡说八道的时候,敌人凶恶狰狞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。先用打手板、鞭背的刑罚,再用灌凉水、吃红枣(用铁棍烧红烙身上的肉)等非人的手段,最后竟用上了电刑。这些刑罚中,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,打几下就麻木了。最难挺的是灌凉水,使受刑人七窍流血,头发变红,就是由头发根往外

冒血,常常使人昏死。电刑过急,一碰就不省人事,对人的伤害非常大。

由于受过电刑,于天放记忆力不好,说话有时颠三倒四。还有一种电刑碰上不马上昏死,专门使人心肉颤动,非常难受、难忍。这些刑罚,于天放受过很多次,但他的抗日信念始终坚定。

于天放愤恨地对日寇主审官永井说:“你不要问我废话了,都知道,我是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特派员、宣传科长,又是中国共产党员,这两个条件有一个已经够枪毙的了,我已经有好几个死刑了,快执行好啦!”

敌人看他态度坚定,意志坚决,威逼利诱都没效果,过了几个月就不再审问他了。当然肉面什么的,早已取消了,换了掺有一半谷子的小米饭,还时常没有咸菜吃。

这时,敌人与于天放有两种不同的心态:敌人是只等执行死刑的命令,把他肉体消灭。而于天放渴望着外面的青纱帐起、草木繁茂的时候,作一次最后的努力——越狱。

于天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,十几年来受到党的培养教育,经历过艰苦战争的考验。他知道,一个革命者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紧急生死关头,要有必胜、必死的决心。此时,摆在革命者面前的只有两条道,一个是胜利,另一个就是死,第三条道是没有的。虽然在黑暗坚固的牢笼里,每逢回忆起党的嘱托,决心就增加了,力量也增大了,越狱的想法更坚定了。

想要越狱,最重要的一件事儿,就是要做越狱前的准备工作。

于天放具体做了哪些越狱前的准备呢?首先是监狱位置的确定。这个监狱在哪?心里得有个数,最起码出去后,你得知道往哪个方向跑能尽快脱险。

抗战时期,于天放在北安的乡村经常活动,虽然也派侦察员进过城,还画过地图,但是这个“秘密监狱”他不知道。于天放是被蒙着眼睛押进来的,不但监狱的位置不清楚,连监狱在北安街的哪个方向也不知道。往外看,窗户的玻璃不透明,好像坐在闷葫芦里,只听见火车在西边嘎嘎地来回走。

每天火车头放蒸汽的声音,都在正南方,估计离车站顶多有二里远。但是这些判断没有人可问,还不能确定。

大概在3月份,特务分室的“关押人员”增多了。原先只有于天放一个人,现在共有五个人在不同的监房。当看守外出时,于天放就问他们:“这监狱在北安街的什么位置?”他们也不知道。

气候渐渐暖和了,冰雪融化了,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。有一天一阵大风把监狱的窗户刮开一扇,于天放趁机往外一看:对面是一座很秀丽的二层灰色小方楼,小巧玲珑,蜂窝式的洋灰墙面,半圆式的窗户洞。在两个窗户洞的中间,还刷着笔直的白色石灰线。

这一重大的发现,于天放找机会告诉了监狱里的其他人,这其中有个姓曲的,对北安的地形比较熟,他想了一会说:“咱们呆的地方一定是在车站北,实业银行斜对过,大马路以西,东边是大街,西边是去黑河的铁路,过了铁路就没有人家了。”

于天放听了以后,心里就有数

了,监狱的位置确定了,周围的情况也了解了,越狱后就往西跑、脱险快。

其次,得有个趁手的打人家伙式,最好是个铁器,这样能一击毙敌,有利于脱身。

这个趁手的打人家伙式上哪去找呢,监狱里啥危险的物品都不给留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于天放还真在监狱里找到了一块铁,原来,在他的监房里有苏联式的“别拉气”(火炉子),它的形状是圆的,很粗,也很高大,是一星管二的,就修在两个监房的间壁墙上,一边填煤烧火,两个屋子都暖和。在于天放监房的这边,有个掏灰口,口上有个小铁门,长有五寸,宽有三寸。小铁门上有铁轴是“活”的。趁看守不在,他把小铁门卸下来,掂量一下,能有半斤沉,假如用力击打头部的要害,还是能把人打昏的,虽然不那么趁手,但咋也比没有强啊。比划完之后,他又把小铁门安上了。

这个打人的家伙式找到了,下一步就得琢磨,在哪个看守值班的时候跑比较好。看守每班是两个人,一共3个班,每个班监视时间是一昼夜,都在监房睡觉,有时看守只留一个人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他发现有两个看守值班的时候适合行动。第一个是警尉石丸兼政,当看守已经一年多,工作厌烦,不安心,好马虎,很懒惰,并虐待“关押人员”,不按时放封“关押人员”大小便,尤其晚上规定9点钟放风,他往往要拖到10点之后,这正是越狱的好时机。其次,他体质比其他人稍差一些。第二个目标是津村政夫,他常和“犯人”唠嗑,警惕性差。另外,他准备参加三等“满语”考试,常常向于天放学习中国话,对他监管有些松懈。至于这两个人谁是倒霉鬼,那还得走着瞧。

以上三个方面解决后,还得考虑得手后这三道铁门咋出去。就是顺利打死看守,倘若没有开狱门的钥匙,也是前功尽弃。因此,必须得知道开三道狱门的钥匙放在哪儿。

起初的时候,看守带了一大堆钥匙,分不清是哪个门用的,到后来,不知道为什么,一大串钥匙只剩了三把,这对于天放来说真是天赐良机,哪个钥匙是开哪个门的,很快他就记住了。白天,看守们常常把钥匙放在对着第二号监房的办公桌上,晚上放在上衣右下方的兜里,这钥匙的问题也基本摸清了。

还有一点更不能忽视,那就是越狱时间的选择。于天放是在1945年1月上旬入的狱,那时的天气零下40多度,荒郊野外没有藏身的地方,而且冬天野外地地上有雪,还会留下脚印。他虽然穿着棉衣,可是没有棉鞋、棉帽,这段时间越狱不是饿死,也得冻死。最好的时机就是7月份以后,庄稼长起来的时候,藏在地里敌人抓不着,满山的野菜饿不死。

最后一点就是确定去哪儿落脚儿,地点定在了讷河、嫩江两县。因为一方面敌人可能着重搜查于天放比较熟悉的地方,像伪北安省全部及伪滨江省一部。另一方面,讷河、嫩江两县都有抗日的群众基础,还有零散小部队。以上越狱准备工作,到5月上旬都准备好了。(未完待续)